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周业安 章 泉

摘要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 and 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关键词 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巨大。Tiebout (1956)、Musgrave (1959) 以及 Oates (1972) 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已经证明,政府间适度分权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钱颖一和温加斯特 (Qian 和 Weingast, 1997) 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有助于改进不同层级政府的激励,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①。这些理论都认为,不同的财政分权体制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具体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给定信息不对称,如果通过中央统一供给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好,而财政分权能够赋予地方政府供给公共品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供公共品;第二,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的多中心利益格局,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竞争,竞争导致要素流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外在压力,从而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第三,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进地方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并激励地方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第四,地方之间的竞争还容易改善当地的公共治理水平。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但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一,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利益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结果一些具有地区外部性的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提供,比如教育和医疗等等。地方的免费搭车行为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第二,地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区际不平等,并且竞赛到底的博弈格局会导致税率下降,从而降低公共品的投入,特别是财政分权所引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流动和不流动要素之间进行税收歧视,从而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剧不平等状况。第三,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自由处置权后,给定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加剧地方的裙带关系,从而加剧地方腐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阻碍经济增长。可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两面的。Breuss 和 Eller (2004)、Eller (2004) 认为,分权和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弧状关系,有一个最优财政分权程度的问题。

* 本研究得到“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以及“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项目——首都经济”项目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前沿”讨论组和“契约和组织理论”讨论组成员的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很多学者对此做了探讨。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后,分权这种模式制度化了。但分权给经济究竟带来何种影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现有的证据是矛盾的。邹恒甫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意味着分权过度了(Zhang and Zou, 1998, 2001; Jin and Zou, 2005);而林毅夫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分权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Lin and Liu, 2000);张晏等人的研究发现,分税制以前分权不利于增长,但分税制以后则有利于增长(张晏, 2005)。矛盾的经验证据似乎暗示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做这样的思考,也可能陷入错误的逻辑。

要正确理解我国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后果,必须理解这种分权模式的本质。和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背景不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首先,这种分权局限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地方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内收支权力以及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毕竟没有独立的税权,所以称不上严格的分权体制,只能算事实上的分权,也即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其次,这种分权仅限于政府,不涉及居民。也就意味着事实上的分权让地方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但居民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地方所受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当地居民。结果,这种非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可以促进增长,但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于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财政作为宪政的本质这一问题,也就无法一致地合理地发现和解释我国财政分权的各种正反作用。

本文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由于本身的制度缺陷,使得其对经济的作用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分权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给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人为的经济波动上。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波动,正是中国这些年经济最合理的刻画。而这种特定的经济画面恰恰来自分权这一制度因素。现有的文献仅仅关注到增长,却忽视了相伴生的波动,从而无法正确揭示分权的真实作用。本文将分以下部分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给出相关的理论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说明和计量方程设计说明;第四

部分是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综述

财政分权通常涉及有关公共职能的权威和责任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在严格意义上,财政分权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其实就是指分权的财政体制,其中的分权特指地方政府或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对独立的税权,包括与征税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和税收征管权三方面。但在没有明确独立税权的条件下,也会存在分权的情形,这要看地方政府是否在财政收支上拥有事实上的部分自由处置权。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分权模式,在地方政府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税权的前提下,拥有了部分公共职能的事实自由处置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这种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激励,从而能够起到促进市场或者保护市场的作用,并相应地促进了经济增长(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6, 1997; 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周黎安(2004, 2007)则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间关系看成是一个类似企业内部的承包制,通过政府逐级实施公共职能外包,并辅之以竞标赛的考核方式,不仅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可观的自由处置权,而且也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促进市场的行为。

一些学者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分权模式和绩效,发现中国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分权,获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比如Blanchard和Shleifer(2000)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行为,认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缺乏权威,被老企业俘获,导致寻租和阻碍新企业参与竞争。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减少了地方俘获的风险,并限制了租金竞争的范围和程度。因此,分权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决定中俄分权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Berkowitz和Li(2000)、Zhuravaskaya(2000)以及Jin等(2005)也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 Berkowitz和Li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税权,这可以解释两国经济绩效差异;而后两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高效财政激励是导致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Matinez-Vazquez和Rider(2005)、Fraschini

(2006)及 Singh (2007)比较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财政分权及其经济后果,他们都承认,中国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而印度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原本就是财政联邦主义的,但两国的经济发展差异恰恰和这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有关。不过他们的结论却不尽相同。Matinez-Vazquez和 Rider (2005)认为,两国的财政分权同样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和对地方政府失控等问题,并且预言这些问题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而 Frasinini (2006)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对地方的预算约束硬化,印度则没有做到这一点。Singh (2007)发现中国的乡村自治程度较高,而印度的权威一直比较集中,他们都认为,这些差别可以解释中国和印度经济绩效的差异。

现有的一些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支持上述结论。林毅夫和刘志强 (Lin and Liu, 2000)的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人均 GDP 增长率有正的、显著的影响,FD 系数估计值为 0.0362。通过财政补贴因素的调整,结果还是显著为正。不过林毅夫等人没有区分 1994 年分税制和以前的收入分享制在财政分权方面的显著差别。张晏和龚六堂 (2004)、张晏 (2005)基于 1986~2002 年的数据分别研究了分税制前后以及全样本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分税制前是负相关的,但分税制后是显著正相关的,全样本数据研究也不再显著负相关。在引入政府支出等因素后仍然如此。刘金涛等人 (2006)利用 1982~2000 年相关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如果用地方自主权作为分权指标,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分税制以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负作用,分税制之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温娇秀 (2006)利用 1980~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

但是仍有许多经验实证研究给出相反的结论。Zhang 和 Zou (1998)首先基于中国 28 个省份 1980~1992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Zhang 和 Zou (2001)基于中国 29 个省份 1987~1993 年的数据同样发现这种显著负相关关系。Jin 和 Zou (2005)把中国省级数据划分为 1979~1993 和 1994~1999 两个阶段,研究发现 1979~1993 年间接支出计算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负相关;但按收入计算的财政分权和增长正相关。

1994~1999 年间支出分权和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收入分权和增长显著负相关。邹恒甫 (Zou)等人的这些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没有取得钱颖一等人所设想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出现了分权过度的现象。胡书东 (2001)从制度变迁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同样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发现,财政分权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给宏观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王绍光 (1997)早就指出,过度财政分权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乔宝云 (2002)分析了分权和不均等的关系,利用 1985~1998 年数据发现,尽管财政分权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财政分权的最优水平是 71.7%。同时,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中国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殷德生 (2004)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既没有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拉大了地区差距。陈抗等人 (2002)认为,在财政分权条件下,内地政府会表现出持续的低效率;张军和金煜 (2005)的研究也发现财政分权会加大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上的相对差距。郭旭新 (2007)认为,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有力的预算约束,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解垚 (2007)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和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有关。只有王玮 (2003)认为,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并不冲突。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究竟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还存在很大争议,这种争议有些是来自财政分权度量口径的差异,还有一些是来自数据选择期限的差异,其他的差异可能来自方法上的或者理论逻辑本身的。无论如何,一些共同的结论是存在的,那就是分税制构成了财政分权的分水岭,分税制以前,绝大多数检验发现分权对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很容易理解,尽管税收承包制赋予了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但承包制的性质决定了这种自主权依赖政府间的谈判,而不是制度化,这就会导致地方预期不稳定,从而弱化其激励;相反,分税制通过制度形式把地方的部分自由处置权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了地方的预期,强化了地方促进市场的激励,所以在经验研究上,大多数文献认为,分税制以后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显著的。不过,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之

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产生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很多文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现有的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首先,分权的效果取决于分权的定义本身。是采取支出分权还是采取收入分权?是采取总量数据计算分权还是采取人均数据或者边际数据计算分权?显然,不同的分权口径对分权和增长的关系研究影响非常大。其次,对于经济绩效的度量也存在很多争议,通常采取人均GDP水平或者增长率来表示绩效,但如果采取生产可能性边界估计或者通过其他形式的估计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再次,时间段的选择。邹恒甫等人的研究之所以更多地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是他们所选择的时间窗较窄有关。而财政分权的作用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窗才能体现其作用。最后,分权带来宏观经济不稳定未必能够说明分权绩效的好坏。从短期来看,分权引致地方政府竞争,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产生了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分权模式,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统观现有的研究,对这些可能存在的争论还缺乏系统的检验,因而无法准确解释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我们将基于标准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进行检验,并把结果和已有的结论进行比较;其次,我们将通过不同的分权口径、绩效口径及时间窗对上述逻辑进行稳健性检验,试图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差异;最后,我们将统一分析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力图全面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后果。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将构造1986~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财政年鉴》。因为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所以本文在1994年之前的实证检验中并没有单独列出重庆市的数据。另外,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我们也将剔除在样本外。因此,本文在回归中1997年之前有29个组别观测点,而在1997年之后则有30个组别观测点。

参照现有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们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_{it} = FD_{it} + wrkrt_{it} + capitalrt_{it} + tax_{it} + xm_{it} + fdi_{it} + urban_{it} + \mu + \epsilon_{it} \quad (1)$$

我们采用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 μ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应, ϵ_{it} 表示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 ϵ_{it} 表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即扰动项。

对于变量来说,被解释变量*y_{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FD表示财政分权度,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讨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并不统一。如有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Ma,1997),有的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Lin and Liu,2000),Zhang和Zou(1998)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指标来度量中国各省份的财政分权度,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各省人口规模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中国省级政府支出水平与其辖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地方政府支出大并不一定就说明其财政分权水平高。同时,如果不能排除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也会错误地度量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如我们可能高估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度量^②,用以刻画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不过,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查,我们也利用其他常见的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检验。

*wrkrt_{it}*是度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我们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capitalrt_{it}*衡量投资增长率,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衡量;*tax_{it}*表示各省份的实际税负水平,参考通常做法,我们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pergdprate	%	530.00	14.19	9.89	-33.69	81.17
分权指标						
fdexp	各省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	530.00	7.61	4.30	0.79	27.95
fdperexp	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	530.00	0.70	0.09	0.51	0.93
fdinc	各省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比	530.00	5.00	4.69	0.19	36.19
fdperinc	各省财政人均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	530.00	0.55	0.17	0.26	0.96
控制变量						
capitalrt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527.00	0.16	0.15	-0.56	0.66
tax	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530.00	0.08	0.04	0.03	0.31
xmrate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530.00	0.26	0.36	0.00	2.38
fdirt	FDI直接利用额占GDP比重	517.00	0.03	0.04	0.00	0.24
nagrpopu	非农业人口比例	531.00	0.31	0.17	0.12	0.85
workerate	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	529.00	0.01	0.03	-0.31	0.34

用各省份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年底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其余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城市化进程。其中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分别用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各省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各省份当年 GDP 的比例和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到。

表 1 给出这些变量的基本描述。

四、实证检验

(一) 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几次重大变革,核心内容就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本质上看,就是探索一个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财政分权体制。这种体制改革隐含地假定过去那种相对集权的财政体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适度地对地方分权则可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在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调试的过程中,就制度特征而言,1994 年分税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1994 年以前,中央和地方通过不同的税收包干形式来实现分权,这种分权虽然赋予了地方财政上的剩余收益权,但由于谈判缺乏基本的法律和体制支撑,所以容易给地方带来预期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而 1994 年的分税制则第一次通过基本的法律框架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规定下来,不仅稳定了地方的长期预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个体升迁区别开来。分权的制度化至关重要,无论谁担任地方领导,都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架构下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不用像先前那样必须一对一谈判。可以预见,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力量能够有效消除税收分成契约谈判的不确定性,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财政分权过程的上述制度特征,必须分 3 个时间阶段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才能真正分离和确认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实际上,邹恒甫等人后期的研究及近期国内的相关研究(比如张晏等人)均考虑到了分税制可能起的根本变化。我们首先进行总体回归检验,时间跨度为 1986~2004 年,然后是对财政分权改革前后进行分别检验,即 1987~1994 年和 1994~2004 年,目的是试图发现改革是否带来实质性变化。

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指标,在表 2~表 3 展示了实证检验的结果。表 2~表 3 都是固定效应 (fix effect) 模型的估计结果。这一选择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由于一方面 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模型,同时各省份自身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影响不同,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不可观测个体特征因素与经济增长不相关,不过就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来说,地区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这种假设可能过于严格,所以我们综合考虑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中国分权式改革确实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效应,不过对于不同的时期来说,这种影响存在差异。

首先,对于 1994 年之前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财政分权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我们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制约了经济的增长。不过,在 1994 年之后,分权式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其

表 2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I)

时期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		
	1986~2004	1986~1993	1994~2004
FD	21.6787*** (-9.8967)	-30.49** (14.8349)	43.2954** 19.1428
Wrkrt	26.5935** (12.9737)	-39.143 (25.4447)	56.8108*** 15.0148
Capitalrt	27.5167*** (2.7899)	12.1784*** (4.0912)	26.8652*** 5.0184
Tax	5.6714 (16.9065)	-13.1611 (42.9270)	-353.8705*** 56.3566
Xm	-1.7587 (2.4904)	-19.8924*** (6.6673)	3.0078 4.0719
Fdi	51.6944** (21.3453)	256.9179*** (54.5210)	37.0164 12.4077
Urban	-2.0471 (5.1659)	-13.2595 (57.6162)	10.3789* 5.7767
常数	-6.5453 (10.5739)	41.6858 (26.7399)	-4.4893 12.8186
R平方	0.2165	0.3427	0.32
F检验值	18.83	11.54	19.26
观察值	496	191	323
组别数	29	29	30

注:(1)分权的度量指标是人均各省财政支出与人均总支出的比重。(2)本文所用检验结论由计量软件 STATA9.2 给出,其中括号内为估计值的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同。

表 3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II)

时期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		
	1987~2004	1987~1993	1994~2004
FD	0.5385** (0.2935)	-1.0284 (0.6794)	1.122*** (0.3998)
wrkrt	25.0236* (12.9528)	-37.0139 (25.0306)	54.6675*** (14.9259)
capitalrt	27.7165*** (2.7920)	12.3846*** (4.0494)	27.2284*** (4.9774)
tax	10.0183 (16.6438)	-7.782 (42.9288)	-364.5403*** (56.4623)
xm	-1.466 (2.4987)	-20.5161*** (6.6558)	2.8115 (4.0441)
fdi	62.424*** (21.0414)	272.4172*** (54.8126)	42.7512* (23.0827)
urban	-0.6809 (5.1639)	-1.027 (58.2572)	11.7679** (5.6703)
常数	7.2329** (3.0269)	23.7211 (17.3726)	17.1488 (4.4282)***
R平方	0.2134	0.3487	0.3268
F检验值	18.49	11.85	19.83
观察值	496	191	323
组别数	29	29	30

注:分权的度量指标是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次,对于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来说,整体时间跨度劳动人员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1994年之前从业人员的上升对经济的增长存在负效应,不过这一效果并非显著,而1994年之后从业人员的上升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的作用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整个时间跨度,还是划分的子区间跨度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都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一发现和我们的国家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是相符的。再次,对于对外开放的成果来说,FDI的增加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有一项回归的结论并不显著,但所有回归的结果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1994年后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表3的实证结果和表2类似。从表3的第一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总的时间跨度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各省份财政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显著上升0.5个百分点。同时虽然在1994年之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第2列显示在1994年前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却呈现负相关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表2告诉我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积极作用,但在1994年前后影响存在差异。

(二) 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变量不仅会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而且还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带来短期的波动效应。我们隐含地假定,经济波动会扰动人们的预期,并导致资源浪费,比如重复投资等,因而必然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如何度量这种波动效应,却是一个难题。现有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由于我们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财政分权的实际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无法通过计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方式来度量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还有一些研究直接通过投资率或者水平的变化来度量波动,但由于投资是一个中间变量,所以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为此,我们决定按照通行的做法,用增长的结果(即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程度来度量波动。

为了寻找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我们参考Philippe Aghion等(2006)的类似处理,将1986~2004划分成3个时间段:1987~1992年,1993~1998年,1998~2004年,每个时间段跨度为6年,然后将每个6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误 $\sigma_{i,t+5}$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经济波动。即定义成如下形式:

$$\sigma_{i,t+5} = \text{stdev}[\ln(y_{it}) - \ln(y_{it-1})] \quad (2)$$

我们利用方程(1)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6年中的均值分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具体估计方程同(1)式。

我们利用4个度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分别是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然后分别对经济波动的指标 $\sigma_{i,t+5}$ 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检验,我们依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

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第3、4列的回归结果不是十分显著,但无论哪一个回归结果,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始终符号为正,说明财政分权确实对经济波动存在正效应,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变化并不影响经济的波动。

在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来说,进出口贸易并不影响中国经济的波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的变化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的度量指标进行检验,都与经济波动显著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也与此类似,表现出与经济波动的正相关作用。

(三) 解释和说明

根据我们的实证检验,有4点结论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大量研究表明了中国分权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研究表明这一结论不能轻率给出。我们发现,一方面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不同,并非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94年之

表4 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差			
	(1)	(2)	(3)	(4)
FD	0.1994*** (0.0314)	0.0299 (0.4581)	0.0274 (0.1210)	0.0417*** (0.0102)
wkrt	0.4221 (0.3696)	0.347 (0.3600)	—	—
capitalrt	0.2795*** (0.1052)	—	0.2631*** (0.0932)	0.2654*** (0.1047)
tax	—	—	—	—
xm	-0.0441 (0.0372)	—	—	—
fdi	0.7179** (0.3225)	0.638** (0.2739)	0.2782* (0.1486)	0.6855* (0.2352)
urban	-0.1936** (0.0795)	-0.2179** (0.0790)	-0.0584* (-0.0308)	-0.1799* (0.0941)
常数项	-0.0516 (0.2155)	0.0926*** (0.0414)	0.0528** (0.0206)	0.0588* (0.0643)
R平方	0.3753	0.3431	0.2971	0.3484
F检验值	5.31	7.18	19.38	7.35
观察值	89	89	89	89
组别数	30	30	30	30

注:第2~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前反而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关系,是因为分税制实施之前,虽然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制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剩余收益权,但这些权利需要通过经常性的中央和地方谈判来获取,这种一对一的谈判的期限较短,和制度的起效时间不匹配,导致制度的资源配置效果不能得到完全释放。更严重的是,这种谈判没有给地方政府官员一个稳定的预期和确定的未来,这就迫使官员不得不更多地追求短期利益,甚至寻租。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谈判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自由处置权。结果,一对一的财政契约并没有对地方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硬性约束,反而成为地方获得更多的事实上的自由处置权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分税制之前的分权可能过度了。这正是邹恒甫等人的结论。后来的研究,比如张晏等人,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其次,我们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可能是导致经济波动的诱因之一,即分权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过去的研究把我国的经济波动归结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或者要素流动、国外经济冲击等各种经济因素,忽略了波动的制度基础。我们的研究证明,正是财政分权这种体制本身会带来经济波动。究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平抑该冲动,不断采取相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的波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种波动。但按照我们的分析,波动的来源则是分权体制本身。

再次,我们发现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对经济起到“两重”作用,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经济的波动,与财政分权的效果类似。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水平,无论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城市化进程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一方面1994~2004年时间段,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分析波动的影响时,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指标,我们都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经济波动。这一结论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会促进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市场经济的完善也会“熨平”经济波动的幅度。

五、稳健性讨论

尽管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从表2~表4可以看出分权式改革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我们也发现了投资的类似作用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波动的“熨平”

效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结论,我们在本部分作一些稳健性检验,来巩固我们的实证结论。

(一)其他衡量分权的指标

虽然我们利用了两种财政支出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并且获得了类似的实证结论。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利

表5 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I)
分权的度量指标3:

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与总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			
时期	1987~2004	1987~1993	1994~2004
解释变量			
FD	0.6772*** (0.1911)	0.1093 (0.4152)	1.9843** (0.9534)
Wrkrt	22.7219* (12.8275)	-35.3132 (25.1882)	55.7868*** (15.0116)
Capitalrt	24.004*** (2.9498)	12.3225*** (4.2050)	29.2236*** (5.1091)
Tax	-42.9868* (22.0106)	-17.9218 (45.2207)	-412.3787*** (63.2361)
Xm	-0.6538 (2.4669)	-18.8963*** (6.8613)	4.5233 (6.1157)
Fdi	59.1449*** (19.3949)	226.6112*** (58.1382)	48.3777** (22.9021)
Urban	3.0163 (2.5745)	-25.6112 (58.8597)	14.7192*** (5.8791)
常数值	7.8059*** (2.5745)	23.507 (17.6500)	20.9578*** (4.3366)
R平方	0.2333	0.3393	0.3249
F检验值	20.48	11.37	19.25
观察值	507	191	316
组别数	29	29	29

表6 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II)
分权的度量指标4:

各省份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			
时期	1987~2004	1987~1993	1994~2004
解释变量			
FD	11.4659* (5.8282)	12.1009 (21.1989)	6.3371*** (2.0701)
wrkrt	23.0552* (12.9535)	-33.5673 (25.3685)	55.1192*** (15.1765)
capitalrt	26.8445*** (2.8203)	11.9373*** (4.2369)	27.9229*** (5.1987)
tax	-29.9725 (25.7805)	-20.7367 (44.4599)	-361.6184*** (60.5624)
xm	-2.4991 (2.5356)	-18.8296*** (6.7099)	3.3355 (4.1052)
fdi	55.5788*** (19.9320)	220.8186*** (55.1817)	53.0956** (24.5452)
urban	2.1804 (5.4190)	-26.4727 (57.5705)	12.4268** (5.9426)
常数值	4.3048 (3.1853)	16.7154 (20.5402)	22.1441 (6.8464)
R平方	0.2193	0.3404	0.315
F检验值	18.9	11.43	18.39
观察值	507	191	316
组别数	29	29	29

用财政收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表5~表6给出了财政收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时实证结果,我们度量分权时分别利用了人均各省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值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我们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无论是表5还是表6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财政分权改革之后都是显著成立,同时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也成立。不过,对于1987~1993年间来说,尽管符号不为负,但由于系数不显著,并无太大说服力。

其次,就税收来说,地方税负的增加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无论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同时,分权式改革之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其他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技术前沿差距

与用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不同,我们考虑其他指标度量经济增长,以便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越好,那么它离技术最前沿的地区差距越小。根据这一思想,我们构造技术前沿距离(the distance to the technology frontier)来度量经济发展。按照我国地区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用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经济发展的技术前沿,那么技术前沿距离 $distant_{it}$ 可以表示如下:

$$distant_{it} = \ln(y_{it}) - \ln(y_{shanghai,t}) \quad (3)$$

其中 y_{it} 表示人均GDP,可以看出技术前沿距离描述了在时间 t 期地区 i 经济增长水平距离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distant_{it}$ 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③。

表7报告了使用技术前沿距离作为我们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5列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

从表7可以看出,即使我们使用了替代指标,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发生改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仍然存在很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同样存在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地区税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前面估计结果不同,此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技术前沿差距存在负的相关关系,且地区税负和技术前沿差距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但又符合我们通常的认识。由于技术前沿指标实际上度量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该指标负相关也就意味着,正是投资这一因素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或者说我们目前这种外延式的增长不仅没有促进地区发展均等化,反而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地区税

负因素正好相反,由于税负涉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以反而能够起到弱化地区差距的作用。这个结论对今后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不同时间窗的选择

前面我们在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时候,将1987~2004年划分成3个时间段:1987~1992年、1993~1998年、1998~2004年,每个时间段跨度为6年。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选择不同的时间会改变我们的结论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不同的时间窗,我们先前得出财政分权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另外划分两个时间窗进行检验。一种途径将时间段跨度缩短,我们使用3年为一时间跨度,划分6个时间段;另一种途径将时间跨度延长,我们直接使用一个时间跨度来衡量1987~2004年经济波动的指标变化为:

$$i_{t,t+2} = \text{stdev}[\ln(y_{it}) - \ln(y_{it-1})] \quad \text{和}$$

表7 其他增长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技术前沿距离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技术前沿距离			
	(1)	(2)	(3)	(4)
FD	1.8452** (0.1865)	0.192*** (0.0036)	0.5444*** (0.0702)	0.0003 (0.0024)
wrkrt	0.5693 (0.1512)	0.4177*** (0.1609)	0.3721** (0.1561)	0.4348*** (0.1656)
capitalrt	-0.1789*** (0.0325)	-0.1611*** (0.0347)	-0.2017*** (0.0340)	-0.1658*** (0.0381)
tax	1.9171** (0.1970)	2.2291*** (0.2069)	0.4469 (0.3107)	2.2677*** (0.2842)
xm	0.0896 (0.0290)	0.0996*** (0.0310)	0.0678* (0.0306)	0.1179*** (0.0319)
fdi	0.5033*** (0.2489)	0.9981*** (0.2613)	1.1332*** (0.2402)	1.5013*** (0.2505)
urban	-0.0369 (0.0604)	0.0174 (0.0645)	0.2609*** (0.0653)	0.087 (0.0671)
常数项	-2.8803 (0.1245)	-1.7901*** (0.0379)	-1.8577*** (0.0384)	-1.6856*** (0.0332)
R平方	0.3751	0.287	0.3306	0.2453
F检验值	40.39	27.09	33.23	21.87
观察值	507	507	507	507
组别数	29	29	29	29

注:第2~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i_{j,t+17} = \text{stdev}[\ln(y_{it}) - \ln(y_{it-1})] \quad (4)$$

我们再次求的方程(1)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3年或18年中的均值,然后将其分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验证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8。

从表8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间窗选择为3年时,结论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很容易看到财政分权确实和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与经济波动显著正相关。这也部分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说明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集中于在投资上的竞争,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当投资发生变化时,也必然导致经济的波动。

另外,我们验证了时间跨度在1987~2004年上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的关系,尽管我们得到结论并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号依然为正(这里并没有给出计量结果)。

六、结论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文献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这些文献要么在内容上缺乏对回归检验的稳健性讨论,要么在体系上忽视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利用1986~2004年中国省级数据,一方面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重新进行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也对财政分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5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分权制度化以后才能实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分税制实施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显著。第二,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第三,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能导致经济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扩大地区差距。第四,地方税负虽然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在分权体制下,也可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第五,城市化不仅能够促进增长,而且也能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无论从支出角度看,还是从收入角度看,分权的增长效应都是正的,这就和邹恒甫等人的结论非常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分权过度了,而我们认为,从增长角度看,分权并没有过度。恰恰相反,进一步的分权能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分权毕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制度基础,如果要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那么就必须要弱化分权的波动效应。同时我们也看到,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如何才能在获得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这些负效应呢?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度分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分权的问题。所谓合理的分权,就是财政不仅仅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部件,更重要的是财政蕴涵着立宪的内容,也就是所谓“公共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以及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负效应恰恰证明,一个缺乏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模式有很多缺陷,会给

表8 稳健性检验(3年时间窗)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差			
	(1)	(2)	(3)	(4)
FD	0.2748** (0.1211)	0.1265 (0.3176)	0.1369** (0.0720)	0.4022** (0.1815)
wrkrt	0.2675 (0.2127)	0.191 (0.2111)	0.1264 (0.2162)	0.1472 (0.2079)
capitalrt	0.1887*** (0.0469)	0.2*** (0.0466)	0.198*** (0.0460)	0.1781*** (0.0454)
tax	0.2071 (0.1807)	0.2761 (0.1820)	-0.1616 (0.2605)	—
xm	—	—	—	—
fdi	—	—	—	—
urban	-0.088 (0.0605)	—	-0.1202 (0.0666)	—
常数项	-0.1536 (0.1267)	-0.0039 (0.0329)	-0.0282 (0.0431)	0.0124 (0.0115)
R平方	0.1574	0.136	0.1651	0.1513
F检验值	5.23	5.55	5.54	8.44
观察值	174	174	174	174
组别数	29	29	29	29

注:第2~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支出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经济带来制度性的损害。

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视角看,目前分权的这种混杂的效果就在于我们仅仅是政府间的分权,而没有把居民考虑进来。或者说,我们并不是在公共财政范畴的分权。从增长效应的角度看,要求进一步分权,但同时,要通过改进政府管理体制,或者进行公共治理创新,来消除分权的负效应。关键做法就是实行公共财政,在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赋予当地居民监督政府、参与政府决策、审核财政预算决算的权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 两代联邦主义理论的比较参见 Oates (2006) 和 Weingast (2006)。

②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内研究中乔宝云(2002)和殷德生(2004)也采取类似的处理。

③ 注意,技术前沿差距基本上取非正数值。

参考文献

(1) 陈抗、Hillman, A rye L、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

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卷第1期。

(2) 郭旭新：《经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化与经济稳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2期。

(3) 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 刘金涛、杨君、曲晓飞：《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 乔宝云：《增长与均等的取舍》，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解垚：《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经纬》2007年第1期。

(8) 王玮：《财政分权与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财贸研究》，2003年第4期。

(9) 王绍光：《分权的极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

(10) 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当代经济科学》2006年第5期。

(11) 殷德生：《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4年第11期。

(12) 张军、金煜：《中国的政府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效率：兼论分税制为什么扩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提交论文。

(13) 张晏：《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15)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6) 周黎安、史宇鹏：《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17)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8) Berkowitz, D. and Wei Li, 2000, "Tax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 pp.369-397.

(19) Blanchard, Olivier and Andrei Shleifer, 2000,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7616.

(20) Breuss, F., Eller, M., 200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re Really a Link?", *CESifo DICE Report, Journal for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2 (1), pp.3-9.

(21) Eller, Markus, 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OECD Countries", Master's Thesis at the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A., Europe Institute, May 2004.

(22) Fraschini, Angela, 2006, *Fiscal Federalism in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hoice- POLIS, Working paper No.66.

(23) 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9-10), pp. 1719-1742.

(24) Jin, Jing and Heng-fu Zou, 2005,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king Paper,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he World Bank.

(25) Lin, Justin Yifu and Liu, Zhiqiang, 2000, "Fiscal De-

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1), pp.1-22.

(26) Matinez- Vazquez, Jorge and Mark Rider, 2005,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Working Paper*, 05-19,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7) Montind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October), 48, pp. 50-81.

(28) Musgrave, R. A., 1959,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29) Oates, W.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0) Oates, Wallace, 2005, "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2, pp.349-374.

(31) Oates, Wallace, 2006, "The Many Faces of the Tiebout Model", In W. Fischel, ed., *The Tiebout Model at Fifty: Essays in Public Economics in Honor of Wallace Oates*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06), pp.28-45.

(32) Philippe Aghion, Philippe Bacchetta, Romain Ranciere, Kenneth Rogoff, 2006,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2117.

(33)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6,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 (2), pp.149-185.

(34) Oates, W.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5)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4), pp.83-92.

(36) Qian, Yingyi and Gé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5), pp.1143-1162.

(37) Singh, Nirvikar, 200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Competitive, Cooperative or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anta Cruz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38) Tiebout, Charles M.,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pp.416-424.

(39) Weingast, Barry R., 2006, "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 Implications for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40) Zhang, Tao., Heng-fu Zo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pp.221-40.

(41) Zhang, Tao., Heng-fu Zou, 2001, "The Growth Impact of Intersection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Alloc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With Applications to China and Indi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 (1), pp.58-81.

(42) Zhuravskaya, E.V., 2000,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 (3), pp.337-368.

BRIFE COMMENTARIES

The Bottleneck in Building a Country with Great Creativity: in a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 by Jiang Wanjun and other writers

"The Principle of Reflection Arc", and China's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 by Liu Juke and Guo Yang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Independent Creation ... by Ai Bing and Chen Xiaohong

The General Forms of the Pattern of the Subjective Gaming..... by Wu Guangzhuo and Yan Qinghua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by Xue Yufeng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ng Infrastructure in Villages upon Welfare by Peng Daiyan and Lai Qianjin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lent Clustering and Industry Gathering..... by Sun Jian and You Wen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 about Value Chain

..... by Wang Shujun, Zhang Sheng and Yu Fusheng

Strategy Choice of Corpo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al Options Approach by Qu Shiyou

A Research on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Based on Knowledge Transfer

..... by Li Dong, Wang Min and Lu Yajuan

ABSTRACTS IN ENGLISH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by Zhou Ye'an and Zhang Qua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ssumes that reform of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can boost economic growth as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could, but the presented empirical evidence contradict this assumption. In addi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have not precisely shown a variety of effects of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By the use of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1986 to 2004, we have scan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in the long ru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has indeed goad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impact of this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s in different times varies: before 1994, it did not act upon economic growth, but after 1994, it did, and noticeably. Meantime, we discovered that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cause for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system of decentralization,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so have simila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and what is particular is that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ill widen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se evidences, the common explanation is that, at present,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is in fact an incomplete and nonstandard decentralization, and that, to weaken its effect on fluctuation while keeping it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order to materialize the sustaine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rucial key is to carry out the public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realize reasonable decentralization under the said new system.

China's Regional Fisc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by Ma Zihui

With the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d the panel data co-integration approach, we hav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China's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and found that, between 1979 and 1993, the provincial-leve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teract and there existed a relationship of two-direction causality between the said revenue and the said expenditure, and that after 1994, only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impacted on fiscal revenue and not vice versa. In the whole period between 1979 and 2005, the provincial-leve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maintained a long-term equilibrium.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ystem reform for tax division has actually strengthened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controllability in terms